唐朝詩人杜牧在《江南春》中，曾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的詩句，極言南朝寺廟之多。作為中國歷史上民族大融合的重要階段，南北朝亦是佛教文化融入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時期。彼時，西南重鎮益州與涼州、建康、長安、鄴城、青州等地共同構成了中國佛教文化的區域中心。正在成都博物館展出的「映世菩提」特展，以南北朝佛教造像為主題，讓觀眾既能看到中國南北文化的多樣性、民族文化的大融合，以及中印兩大文明間的宗教、文化與藝術交流。

大公報記者　向芸（文／圖）

菩提造像

見證南北朝佛教藝術

◀來自鄴城的菩薩立像、立佛像、佛頭像等，均出土於河北省邯鄲市臨漳縣

▶南梁太清五年（551年）阿育王像，是目前全國發現的唯一一尊南朝阿育王全身像　成都博物館供圖

▲南梁天監十年（511年）王州子造釋迦像，出土於四川省成都市

「映世菩提」特展，展出川、冀、魯、甘、陝、蘇、浙、鄂等省十二家文博單位的一百零二件／套展品，以全新角度及視野審視南北朝造像，觀眾除可看到南北文化的多樣、民族文化的融合，以及中印兩大文明間的宗教、文化與藝術交流，亦能窺見王權政治和宗教信仰的結合，乃至佛教對普通人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影響。

從目前的考古發現來看，南朝的佛教造像流傳於世者遠較北朝罕見，主要的考古實物資料集中於益州（即今成都及周邊地區）。從清末光緒年間開始，成都萬佛寺、彭州龍興寺及四川茂縣、汶川等地陸續都有南朝造像出土，印證了益州佛教文化的興盛，也填補了中國南朝石刻的空白，為南北朝時期佛造像藝術研究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史料。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博物館館長、考古系教授，香港城市大學客座教授霍巍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的過程中，其造像在題材、衣飾、背景、所處的環境等方面，都有多種元素的不斷增減。「中國匠師會按照東方人尤其是中華民族的審美習慣，對其進行改造，而這一過程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表現得尤為明顯。」

霍巍說，此次展出的佛教造像既有來自陸上絲綢之路的佛教文化的影響，也有通過長江中下游地區與海上絲綢之路聯通後傳遞的佛教文化因素，反映了南北朝時期中外文化的交流，尤其是佛教藝術傳入我國後不斷中國化的歷程。

「褒衣博帶」袈裟 佛教中國化標誌

走進展廳，伴着悠揚的佛樂，最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尊一佛四菩薩組合的背屏式造像——南梁天監十年（公元五一一年）王州子造釋迦像。其中主尊身穿的「褒衣博帶」式袈裟，是佛教中國化的代表。據了解，「褒衣博帶」本是對中原華夏民族傳統襦服的稱謂，其特徵是長襟大袖、腰束寬帶，多為士大夫穿着，易於坐立而不易於勞作或騎射。

說到「褒衣博帶」式袈裟，霍巍特別介紹了南齊永明元年（公元四八三年）造像碑。這是目前我國發現的最早有明確紀年的褒衣博帶式佛教造像碑，也是四川地區現存最早有明確南朝紀年的南朝造像碑。

霍巍表示，這尊造像碑在四川茂縣由農民挖出來時已破碎成四件，還差點在軍閥混戰時被倒賣到國外。「它引發了全球考古學家、美術史家近一個世紀的討論。因為其衣飾不再是十六國時期舊式金銅佛像的『通肩式』袈裟，也不是北魏雲岡石窟佛像的『袒右式』袈裟，而是一種新的衣飾樣式——漢式的『褒衣博帶』。」

在霍巍看來，「褒衣博帶」式袈裟的出現，是佛教造像在南北朝時期發生的最重要變化，也是佛教藝術中國化的最重要標誌。同時，成都地區的南朝造像還有很多獨特的題材。「比如阿育王信仰在中國流傳很久，文獻當中也多有記載，但真正阿育王的造像卻僅僅在成都和西北地區的造像中有過發現。」

阿育王是印度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國王，其在位期間是印度佛教的黃金時期。此次展出的阿育王像，是目前全國發現的唯一一尊南朝阿育王全身像，為研究印度佛教在南朝時期的傳播及中國化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學資料。

記者在展廳看到，這尊阿育王像赤足站在仰覆蓮圓台上，有螺狀肉髻、突起的顴骨和八字鬍，頭光大部殘缺，其上裝飾有貼金聯珠紋及佛圖案。不同於其他立佛，他露出了腳踝，同時兩腿之間及左手下的服飾紋路都為豎線狀，體現出佛教剛傳入中國時人們腦海中阿育王像的形象。

文物珍品
（地圖標示佛像出土位置）

②北涼承玄元年（428年）高善穆石造像塔：

出土於絲綢之路河西走廊的甘肅酒泉，塔基上的八卦符號來源於中國道教，塔身上彌勒佛的交腳式坐姿則來源於印度。這件石塔是迄今所發現的中國模仿印度覆缽塔的最早實例，體現了佛教傳入中國後，逐步從中國本土文化、本土宗教中吸收、借鑒甚至融合的過程。

①南齊永明元年（483年）造像碑：

發現於四川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茂縣，位於「絲綢之路河南道」岷江支道的必經之路。「褒衣博帶」造像衣飾和台座與此前印度、西域一帶的佛像不同，是中國佛造像的重要轉變，亦是南朝佛造像的代表之作。

③北魏太和八年（484年）石雕柱礎：

出土於山西大同司馬金龍墓，用作插放屏風或帳幔等，被視為佛教文化在中國廣泛傳播的映證和折射。

⑤東魏武定五年（547年）弄女造彌勒像：

出土於河北邯鄲。南北朝時期彌勒信仰在上層社會和民間流行，彌勒造像成為佛教造像中的主要題材之一。

掃瞄QR code，看「映世菩提」視頻

④南朝（420–589年）青瓷蓮花尊：

出土於湖北武漢，最晚於南朝中期開始生產，繁榮於南北朝晚期，並持續燒造至隋初，且大多成對出土於高規格墓葬，可能為上層貴族禮佛用器。

⑥北齊（550–577年）彩繪石雕思惟菩薩像：

出土於山東青州龍興寺。思惟菩薩像是一種極為特殊的造像題材，公元三世紀左右傳入中國，此後又傳播到朝鮮、日本等地，成為東亞佛教造像的重要造型之一。青州所出思惟菩薩像形體較大，單尊，肩部低垂，是典型的中國漢人體態。

⑦北齊（550–577年）彩繪石雕法界人中像：

出土於山東青州龍興寺遺址。佛像身着的袈裟之上分為十三個界格，刻有山巒、樹木、宮殿、人物等。南北朝時期在古青州地區分布最集中、數量最多，還見於新疆、甘肅一帶。

⑧東魏（534–550年）貼金彩繪石雕佛菩薩三尊像：

出土於山東青州龍興寺。在印度，龍的形象非常普遍，但在佛教造像上卻未曾見到。此造像的主尊佛腳下出現了龍口吐蓮葉、蓮花，這一改變是佛教漢化的一個重要表現。

南北兼容 為盛唐佛教藝術奠基

如果說南朝宋、齊時代，成都地區的造像更多地顯示出西北一帶涼州造像的影響，那梁武帝滅齊之後，成都南朝造像開始大量吸收來自南朝政治中心建康（即南京）的文化因素。此次展覽中，就有一件出土於南京市的造像——梁大通元年（公元五二七年）銅佛造像，這也是南京地區出土的唯一帶有明確紀年的南朝造像。

梁代海上交通的發展，使海上諸國傳來的大量經像對南朝佛教藝術的影響加強，成都地區也出現了印度笈多王朝秣羅樣式的造像。如出土於成都的南梁中大通元年（公元五二九年）道猷造釋迦像，其袈裟輕薄貼體，衣褶像一道道水波紋，可以清晰看到身體的輪廓。

在皇室大力推動下，梁代整個社會都開始信仰佛教，佛教在平民階層中也成為其祈願的途徑。南梁時期，形體較小、便於攜帶和家庭供養的背屏式造像，就成為當時益州造像的主要形式之一。

據導賞員介紹，背屏式造像的供養人多數是佛弟子或比丘、僧尼等，將對亡者的祈願和對生者的美好祝福寄託於造像上。這些世俗化的祈願，以及隨葬品中佛教因素的出現，體現了佛教中國化進程中與民間信仰的結合。

相較於同一政權下的梁大通元年（公元五二七年）銅佛造像，由於地理環境和本土信仰等因素的影響，四川背屏式佛教造像上的內容更為豐富，不僅出現了一佛四菩薩，還在背屏上有大量飛天造型。

南梁後期，西魏攻取蜀地，將益州高僧五十人遷入長安，南北佛教文化的交流加強。北周滅西魏後，蜀地又歸屬北周，以益州佛造像為代表的南朝佛教藝術對北方地區的影響日益明顯，長安、鄴城、青州等地均發現帶有南朝風格的造像。同時，益州地區佛教文化與受到北方佛教藝術的影響，呈現出兼容南北的特點。

此次展覽亦展出了青州、鄴城等地造像。導賞員表示，鄴城素有「佛都」之稱，北魏後期，受孝文帝漢化政策的影響，鄴城模仿南朝造像風格的「褒衣博帶」「秀骨清像」式造像大量出現。而北齊時，鄴城受印度笈多造像風格影響，繼承北魏以來背屏式造像龍、塔、飛天、瓔珞等傳統因素，同時充分利用東魏以來白石造像的透雕技術，形成了以「龍樹背龕」造型為典型特徵的新式造像。

而青州自東魏晚期起，受印度秣菟羅風格的影響，輕薄疊褶服飾的造像興起，逐漸發展出具有地方特色的「青州樣式」。在南北朝晚期造像中，「青州樣式」的外來特徵最為鮮明，同時體現了漢式佛像藝術與印度笈多藝術的融合。最具特色的盧捨那法界人中像，一褶衣帶、半截佛手的細碎殘件等，均體現了青州造像的「巧奪天工」。

四川大學博物館館長霍巍表示，這些佛教藝術珍品，繼承了從東漢以來到十六國這些早期佛像的特點，同時經過南北朝「大熔爐」的融會、創造，為盛唐佛教藝術的綻放奠定了基礎。

小知識

「佛從西來」

佛教誕生距今已有二千五百多年，與基督教、伊斯蘭教並稱為世界三大宗教。人們常說「佛從西來」，陸海絲綢之路作為最重要的東西方文明交流通道，可謂是見證了佛教「遠道而來」，先影響西域再影響內地、由西北向東南擴散的歷程。

佛教的傳播也帶動了造像的興盛，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由於政治、宗教、文化和社會風俗等多方因素的交互作用，佛教造像藝術也在不斷地發展和嬗變。